

# 并非无处可去的文学

## ——2024 年长篇小说漫评

□ 孟繁华

### 一 半个多世纪:乡村在文学中的变革

柳青的未完成稿长篇小说《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 年第 1 期)的发表,无疑是文坛的一件大事。柳青虽然于 1978 年去世,但仍是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传奇人物,他的《创业史》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文学经典,他的文学经验仍然是当代中国最宝贵的文学经验之一。《人民文学》杂志在发表《在旷野里》时,在“卷首语”中说,这部长篇小说“虽是未完成稿,但作品叙事相对完整,表现出对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高超把握,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我完全同意编者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总体评价。小说的背景是 1951 年 7 月初的盛夏时节,故事发生在陕西渭河平原某县,讲述新县委书记朱明山上任遭遇的人与事。因此,小说亦可以看作“县委书记上任记”。朱明山到任遇到的重要问题是棉蚜虫害的发生。在这一核心情节中,在与官僚主义和各种复杂关系的博弈和破解中,生动地塑造了县委书记朱明山的典型形象,同时塑造了副书记、县长、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以及众多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形象。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的长篇小说。

应该说,这是一部柳青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毛泽东希望延安的文艺家们“走向民间”,学习人民群众的情感和语言,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柳青自觉地遵循“讲话精神”,在向生活学习、向人民学习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期许。

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未完成稿,或者说作者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打磨和润色的小说,“未完成性”显而易见。比如情节、细节以及叙述的细部等还有粗糙的痕迹,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还略显简单。社会主义初期文学遭遇的问题,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梁斌的脸谱化、表面化以及同僚们畏首畏尾左右为难的心理和表现,都还流于表面。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作为表现社会历史大转型时代的长篇小说,我们更应该看到柳青卓越的探索和努力。那个时代还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参照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柳青敢为人先,大胆地探索和实践新的人民文学的勇气,给今天仍然探索、实践的中国作家以巨大的鼓舞。他的文学理念,他拥抱生活、讴歌人民、书写新的人物和

新的世界的创作道路,是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这个主题至今仍在延续,而且成为国家文学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从柳青的《在旷野里》到鬼子的《买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年出版),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漫长的时间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从文学的意义上,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检视的,是西方的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鬼子已无《买话》从一个方面替我们作了回答。《买话》写了一个叫刘耳的老人的返乡之旅,他要回到故乡,那里有味蕾的深刻记忆,有他对男女之事的初次体验,也有他少年和青年时代不曾示人的诸多隐秘。《买话》有对现实的批判。乡村中国经历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有不同的讲述,那是《人生》,是《陈奂生上城》,是《种包谷的老人》,是《命案高悬》,是《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现在的《买话》。高加林、陈奂生、冯么爸、尹小梅、陈金芳和刘耳等,构成四十多年来乡村人物的序列形象。当然,还有《买话》中的十几个光棍,还有竹子、香女、老人家等。只有走进生活的细部,我们才会了解真实的乡村中国。《买话》的生活化弥漫四方,小说就像一条生活之河,瓦村的生活细节在河流中不时泛起,我们仿佛置身于瓦村的人物和生活之中,他们因鲜活生动而充盈着生命力。另一方面,《买话》的价值更在于它用隐喻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当下乡村中国的故事。表面上它波澜不惊,但只要认真阅读,就会知道什么是惊心动魄。《买话》的成功,是一切都在云淡风轻的讲述中,生活的力量无比巨大。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的褶皱里,历史不会讲述他们,但细节构成的历史是难以颠覆的。曾经光鲜的刘耳,在“重述历史”中轰然倒塌,个人的历史也是经不起拷问的,我们自己也曾忘记或抹去某些历史,一如史官讲述历史一样。而他要疗治的“前列腺炎”,是老人家用一片葱叶和一根竹筷子治愈的,他的尿道通了也是一个隐喻,他自青年时代开始的纠结和谎言被彻底戳穿,也就被彻底地疗治了。当竹子的母亲、“乡村郎中”老人家去世时,瓦村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所有人来了,他们去为一个老人家送葬,也是在为一种再也难以经验的生活凭吊。那里隐含的巨大感伤如惊雷滚地丽日经天。现代性改变了乡村中国,但现代性的两面性我们并没有充分认知,特别是它的“另一种面孔”。

### 二 国事、家事、心事和秘史

《湮没与重生》(作家出版社 2024 年出版)是青年作家程荫的长篇新著,是一部结构宏大,场景恢宏,人物众多且国籍、身份复杂的小说。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这极具写作难度,不仅历史久远,而且涉及多个国家和大规模的战乱。作者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直接经验,她只能凭借资料和艺术想象力,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其成就了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小说中不仅有北京、上海、青岛、广州、长春等国内重要城市的风光和风情,有变革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男女爱情;有诸如法国巴黎、德国汉堡、地中海等不同地区;更有诸如姜半喜、钱默之、艾瑞斯、布克船长、迈尔中尉、卢卡中尉、雷奥叔叔等不同的中外人物。因此,这是一部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描摹不同国度不同风情的小说,是一部刻画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人物形象的小说,是一部书写青年爱情和追求自由的小说。小说设定了如此众多的场景,背后隐含了作者对写作自由,对精神和情感自由驰骋的定义和追求。在我看来,程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她的期许。小说用人物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对世界、对战争的立场和态度,表达了年轻一代的历史叙事和想象,实现了她“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的宏大愿望,成为一部表达正面价值观的优秀作品。

彭学明的《爹》(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3 年出版),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湘西传奇,是一部“献给我的湘西父辈”的小说。小说从抗日战争书写至 20 世纪 90 年代,书写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既是“爹”的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历史,既是“爹们”的苦难历程,也是大动荡时代的英雄史诗。这是一部试图表达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风云际会、国家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小说。湘西的历史变化,也是中国历史变迁的缩影。小说在艺术上是一种“众声喧哗”“多音齐鸣”的叙事,不同声音参与了对“爹”的讲述和塑造。五叔、韭菜干娘等乡亲们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爹”和武家干爹的形象。不同的声音就是不同的角度,多种角度对“爹”彭家云和“干爹”彭武豪的讲述和转述,使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生动而真实。小说湘西方言土语的使用,不仅强化了小说的地域性特征,表达了湘西的风土人情,也强化了小说讲述的真实性。

如果说《湮没与重生》《爹》表达的是国家民族的大叙事,那么《人间信》(花城出版社 2024 年出版)则是家族的秘史。终结了谍战故事之后,麦家创作了《人生海海》,有惊人的发行量。这不仅说明麦家的读

者和拥趸数量居高不下,同时也证明了麦家拥有正面创作小说的才华和能力。2023 年,麦家在《花城》开设专栏“弹棉花”,共有《老宅》《鹤山书院》《在病房》《双黄蛋之二》《金菊的故事》《环环相扣》六篇小说。将专栏命名为“弹棉花”,当然是麦家有意为之。“弹棉花”是一种劳作,更是一种意象。“弹棉花”者,谦恭、卑微,任劳任怨。麦家选择了这样一种意象,足见此时期麦家的心境和姿态。当然,这与他书写的题材和人物有关。这些小说的内容,当然是虚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的内容与麦家的经验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麦家的“村志”“村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所理解的乡村文明史的一部分。一方面,通过诸多亲人乡邻的遭际和命运,麦家要表达的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关切,表达一种与人的终极追问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有人难以超越和令人终极困惑的“万古愁”,也有困惑转化的浩茫心事,这心事——是来自家乡的忧伤和无解,是人生无常的万般慨叹。这是麦家这些小说共同的情感特征。另一方面,麦家对故乡往事用尽心思的书写,也可以看作对故乡和家族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本质上,那就是乡土中国曾经的生活,是那片土地上普罗大众曾经命运。

这部《人间信》,接续了“弹棉花”的思路,讲述了富春江边双家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样貌,写中国农民的劣根性和前现代乡村文明的诸多弊端。因此,《人间信》本质上是一部批判前现代乡村文明的小说。《人间信》不是国事,它是家事,是私密的家族史。但也不是家族小说,这一点麦家非常清楚,有了《红楼梦》《家》《春》《秋》《白鹿原》,家族小说的高度几乎很难再超越,因此,他写了父亲的隐秘史而没有写家族的盛衰沉浮。父亲的形象虽然不值一提,但他有一颗慈悲和向善之心。他之所以被打成“黑五类”,是因为他救了一个日本儿童,因此成了“坏人”。过去在奶奶眼里他是一个“潦坯”,现在他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但是,也正是这一笔,蒋德贵的性格得到了救还。在这个意义上,《人间信》是一部有鲜明现代主义气质的小说。我们知道,到现代主义,小说不再写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古典文学的追求,要写出崇高、悲壮的美,现代主义不再这样处理和塑造人物,而是要写那些无力、无助、无奈和无望的人物,卡夫卡、加缪无不如此。《人间信》没有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壳,但它的精神取向,通过人物表达得一览无余。它是用乡村中国的元素,构建了它现代主义的小说王国。这是麦家的过人之处。

这是一个科技神话无处不在的时代,也是一个科技神话恣意横行的时代。在互联网的神话渐次消失之后,AI 登场。这个 AI 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和人交流,可以替代许多职业,甚至可以成为伴侣,当然也可以替代作家进行创作。也就是说,AI 要逐渐替代人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体。是 AI 疯了还是人类疯了?如果真是这样,人类不是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对这个毫无用处的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还会怀有多少期待?AI 或许无所不能,它可以改变世界,可以创造未知的一切,但文学更有义务纠正科技神话的癫狂:事情不是那样的。和科技神话比较起来,文学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文学可以改变世道人心,可以在更深远处做到 AI 永远做不到也看不到事。因此,我们的文学并非无处可去,尽管它还有许多令人不满意的方面,但在科技主义神话无处不在的时代,并不意味着它无路可循寿终正寝。

陈继明的《敦煌》,叶兆言的《璇家花园》,张楚的《云落》,老藤的《草木志》,津子围的《大辽河》,吕新的《深山》,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董立勃的《尚青》等,是 2024 年长篇小说的翘楚,在不同的题材领域都有新的创造,在艺术上的新探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 三 两个时代的都市生活

中国的城市文化还没有建构起来,城市文学也在建构之中。一方面,我们充分肯定当下城市文学创作的丰富性,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有可能部分地了解当下中国城市生活的面貌;另一方面,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也确实表现出过渡时期的诸多特征和问题。城市文学的热闹和繁荣仅仅表现在数量和趋向上,而城市生活最深层的东西还是隐秘的存在,最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很可能没有在当下的作品中得到表达,隐藏在城市人内心的秘密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具体地说,当下城市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城市文学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没有“共名”式青春形象以及城市文学的纪实性困境。这是我对当下中国城市文学抱有的某种隐忧。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以城市生活为创作背景的作家的坚持和努力。他们正在努力地勘探和发掘城市生活的深层秘密。这个深层秘密就是城市生活的隐结构,它不在光鲜的城市生活表面,不在高楼大厦的写字间,也不在标示城市现代化的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工具中,它在人的心里。城市人心的秘密才是城市生活的深层秘密,谁发现了这个秘密,谁就有机会、有可能创作出生动的城市故事、撼动人心的城市人物。张欣被批评家雷达称为“当代都市小说之独流”,“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这个评价体现了张欣在当下都市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从张欣的创作实绩看,雷达的这一评价非常中肯客观。张欣的都市小说大多与当下生活有关,在呈现人的无边欲望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对人的终极关怀。这是张欣的小说与一般的通俗文学的区别。但这部《如风似雪》(花城出版社 2024 年出版)离开了当下,写的是广州 1932 年到 1942 年十年的历史。这里

### 四 主潮之外的文学想象

才会最大限度地写出大唐雍容华贵的万千气象。

《空城记》(译林出版社 2024 年出版)是邱华栋三十年构思、六年写作的皇皇巨作。小说以龟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这六章结构了这部长篇小说。繁复的历史,苍茫的废墟,复杂的人物,瑰丽的风情和奇异的传说,构成了西域两千年的史记、传奇和赞美诗。他要找到打开千年历史的钥匙,更要描绘新时期升起的信号。可以说,在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中,这部小说取得的成就是极为引人瞩目的。

历史的写作也是一种“虚构”,对历史书写的选择就是虚构的形式。比如,在“龟兹双阙”中,小说选择的是西域音乐,贯穿小说的是汉琵琶的声音和形状;在“高昌三书”中,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和帛书、砖书、简书等记录、书写和流播的方式;在“尼雅四锦”中,选择的是汉代丝绸在西域的发现及背后的历史信息;在“楼兰五叠”中,选择的是楼兰历史层叠的变迁,贯穿其间的是一只牛角鸣响;在“于阗六部”中,选择的是于阗出土文物背后的想象可能,涉及古钱币、简牍、文书、绘画、雕塑、玉石等;“敦煌七窟”涉及的是佛教的东传和敦煌莫高窟发生的人间烟火故事之间的联系。因此,《空城记》在结构上是一种并置结构,它与我们常见的线性结构、复调结构等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小说有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构,为作家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历史小说不止要还原或激活历史。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克罗齐看来,编年史是没有生命力的死的材料的编排和堆集,而真历史则是活生生的历史。既然是活生生的历史,那么“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当然的结论。一般我们认为并非当代而属于“过去”的历史,只要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某种意义,还是鲜活而非空洞的,那么这种所谓的过去史实际上也就是当代史,和一般所谓的当代史并没有什么区别。克罗齐这样解说其间的奥秘: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活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寻求对于过去事实的知识;因为那种过去的事实,是

有时代的风云际会,有革命的风起云涌。但这又不是一部典型的历史小说。张欣在自序中说:“我选择了 1932 年至 1942 年这段时间的广州,因为民国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谓上流社会大多由军阀和买办构成,社会风气是异化加变态,表面攀龙附凤,极尽奢靡,实则毫无自立能力,基本是用金箔包裹腐朽。”这段话可以看作理解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4 年出版),和张欣的《终极底牌》年代不同,内容、风格和气象也极不相同。这是一部写工人生活的小说。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改制转轨,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面临着下岗。这是一个给人带来极大压力的坏消息。这个写实性的开篇似乎要以“正面强攻”的方式书写国企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小说并没有沿着这个现实的路径向纵深发展。情节突然旁逸另一个方向:镇虎山上又发现了老虎,为了防止老虎进厂伤人,厂里成立了“打虎队”。刘丰收在多重压力下带头参加了“打虎队”。这个情节和京剧《武松打虎》发生关系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刘丰收参加“打虎队”上山打虎,具体的情形和细节,还隐含另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是《林冲夜奔》。因走投无路才加入“打虎队”的刘丰收的妻子和车间副组长张红旗长期通奸,虽然不及林冲妻子被高衙内欺负悲惨,但故事性质有相通之处。林冲夜奔写尽了一个“可怜人”的无助和无奈,刘丰收上山打虎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林冲的命运是实实在在地被发配沧州;刘丰收则是自演自导了一出荒诞戏。有趣的是,小说迷幻与现实交织,李修文对中国古代文学资源的深度发掘,使小说呈现出无限的可能。这既是对古代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也是空前的创造。李修文出乎史,入乎道,其化用浑然天成,获得了石破天惊的文学效果。

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的,就是在呼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兴趣。这一论点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总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以当前为参照来观察和认识历史。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和关切,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它就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只能是死的历史而不能成为活的历史。确定和了解一切过去的历史事实并不是任何历史家的任务,例如并没有人试图去探究“公元前第一个寿终正寝的罗马人是谁”这样的问题,因为这虽然也是历史事实,却与我们当前的生活无关。克罗齐的这个看法,既证实了历史叙事的建构性,也证实了历史的“当代性”。

陈众议的长篇小说《冥合天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 年出版)在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显得特殊而奇异,无论题材还是写法都极为稀缺。它书写的内容在人鬼之间,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在无尽的荒诞和莫名的奇幻之间,也在真实的历史和模糊的当下之间。因此,这是一部让人惊心动魄的小说,是一部构思奇诡异文辞畅达的小说,是一部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小说。作为小说,它是虚构的,但它表达的一切都以现实基础为前提。在破除迷信、扫荡邪恶的意义上,《冥合天人》也可以说是文学的钟馗,正义的卫士。

陈众议是著名的学者,有诸多影响广泛的学术著作问世,有众多的学术荣誉和头衔。他也曾出版多部长篇小说如《玻璃之死》《风醉月迷》《如是我闻》等。我认为《冥合天人》是一部学者小说。小说不经意地流出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比如王阳明的高论,瞿秋白的自述以及他们那充满理性和时代气息的辩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主人公“我”身上那种理性的、不屈不挠的坚韧和勇武,那种敢于担当、决不放弃的打击邪恶、捍卫正义的精神。在艺术上,小说出神入化的想象力给人深刻的印象,“如是大师”的镇定自若和“我”的执着坚定,不仅构成了人物性格的两极,在比较中强化了人物性格,而且使故事更具刺激性和紧张感。因此,这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看的小说。

原载《小说评论》2025 年第 1 期

本版责编:崔 倩